

分野与整合： 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边界再议

□ 宋学勤 杨宗儒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一、厘清和划定学科边界是保持学科独立性的重要前提。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史跨学科研究成果总体质量不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研究者的学科边界意识淡薄却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

厘清和划定学科边界是保持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独立性的重要前提。在跨学科交流中,一个学科要保持自身的独立存在,必须要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相对清晰稳定的学科边界。如果某一学科的边界被不断蚕食或者模糊不清,势必危及整个学科的独立身份与“合法”存在。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在起步阶段遭遇的学科危机便颇能说明这一问题。由于同社会学的界限不清,起步阶段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曾引入大量社会学术语和完全借用社会学的理论模式来建构社会史体系,出现了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理论体系建构中的所谓“社会学化”问题,造成了社会史史学本位的旁落。虽然“历史学变得越来越社会学化,社会学变得越来越历史学化,这样对两者都有更多的益处”,但社会学与社会史毕竟是两门有着根本性差异的学科,相比于社会学,作为史学分支的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其学科属性只能是历史学而不能是社会学,求真始终是其第一要务。

如果在学科交融中无视边界的存在,那么当代中国社会史就会日渐失去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只有在厘清和划定各自学科边界的前提下,每门学科才可能以独立的身份自立于学科之林,并为其他学科提供本学科独到的见解。正如英国学者劳埃德所强调的那样:“一个学科要确立自身的地位,其所受的双重限制是:一方面,它需要固定的边界,且需要有序的精英队伍去捍卫这些边界;而另一方面,为了达成它所需要的连续不断的成功(尤其是在科学领域),它需要保持对各种异见的开放姿态”。而那种“声称学科的权威正在消失,学科边界已经消融,则是天真的,甚至是危险的”。学科边界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史的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基础性意义,清晰的学科边界是实现良性的学术交流和学科互鉴的重要依据。

二、清晰的学科边界是实现良性的学术交流和学科互鉴的重要依据。从当代中国社会史跨学科研究中出现的边界不清问题入手,结合具体的社会科学理论概念与历史学实证研究成果,阐释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将其他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规范地应用于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将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和完善。

边界不清在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理论或分析框架的先行取向。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和逻辑前提,如果不加甄别地先验性地将其运用于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很可能会诱使研究者得出与历史实际不符的结论。

边界不清在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另一种表现是社会科学概念的直接挪用。需要明确的是,社会科学中使用的主要概念绝大多数出自研究西方社会的学者,这些概念往往附有特定的价值预设,将之运用于研究中国问题时需要谨慎辨析,考虑其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适用性问题。

必须指出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固守学科本色,还需防止将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混为一谈。

三、跨越学科边界,实现问题意识、理论视角和技术方法的创新。尽管厘清学科边界有助于保持学科的独立性、促进学科的发展,但如果过分强调学科边界,也会导致思想的桎梏和偏见的加深,从而抑制学科的发展,即“专业化无可避免地意味着对学科的关注重心进行缩限处理”。正因为如此,对于跨越边界走向跨学科的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而言,既须固守史学本位,又要不为学科边界所束缚,应勇于打破学科边界,充分借鉴并整合其他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实现自身的进步。

那么,跨越学科边界能够为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带来什么?诚如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所言:“某种意义上社会科学就像一个巨大的仓库,贮存着成因理论和有关因果关系的概念,问题是怎样从乱糟糟的杂物

堆中找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根据特殊的经验事实,通过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研究者可从社会科学理论中获得不同的益处。以下将以社会学中影响较大的社会流动研究为例,分别从问题意识、理论视角和方法与技术三个方面,提出当代社会史研究科际整合的可能途径。

1. 问题意识层面的整合。目前,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界有关社会流动的研究多集中于改革开放前城乡人口在地理位置上的水平流动,缺少对垂直流动的深入研究。在此情况下,有必要整合社会流动理论的思想资源,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提供新的问题意识。

在社会学视域下,社会流动研究的传统核心问题意识在于考察一个社会的开放性与平等性程度如何。在方法上,它多以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分析为框架,其中,代内流动关注个人当前的社会地位获得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比较“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的不同影响程度。

代内流动研究能较为详细地表现出“具有不同背景和特征的个人的机会结构分布和社会选择机制的运作”。代际流动关注父亲社会地位与子女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由于时间跨度较长,代际流动在反映社会结构变化趋势方面有其独特优势。

社会学关于社会流动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提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者,在宏观层面描述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过程、认识当代中国社会总体特征固然必要,但从动态的社会流动意义上立足于个人、家庭对社会结构特征进行微观透视也非常重要。

具体而言,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形塑了怎样的社会流动观念与体制?变化了的社会流动观念与体制对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有何影响?个体又如何实现社会流动?不同类型社会流动的背后折射出怎样的社会变迁特征?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无疑有助于深化对特定历史时期当代中国社会特征的认识。

2. 多元理论视角的整合。从社会流动理论视角出发,当代中国的一些政治运动以及它们与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关系能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家庭背景、个人特征、革命与社会变迁等对个体或群体社会流动的影响在既有的社会流动研究成果中有较多讨论,而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对社会价值观念、人的心态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则被忽视。

1949年以后,在新生人民政权的社会改造浪潮中,中国的社会流动模式发生明显变化。“传统的流动方法受到怀疑。私人攒钱买地或投资于商业和工业,被认为与国家所有制不相容。教育专业化和职业取向性被批评为太个人主义。个别家庭无从冒尖,无法挣得高出集体的一般水平的报酬。同时,集体还被授权,决定谁可以被选拔到公社机关、城市企业或保送

到‘文革’后的大学”。随着社会流动渠道与机会的改变,为了达到向上流动的目的,人们的价值观念、心态和行为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从社会流动模式改变的角度解读当代中国的一些重大政治运动和社会行为,研究者会得出新的见解。有学者指出,社会流动模式对人的行为产生明显的作用,这种作用有时是非常强大的。其对政治运动中一些民众行为的解读,正是以社会流动为视角展开的。

3. 技术与方法的整合。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提出:“历史学中的新趋势是对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的反应。唯有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才可能使历史学有所发展。”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存有海量的文字材料、各类统计数据、丰富多样的影像资料等,为各学科研究方法在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广泛应用提供了无限可能。如在社会流动研究中,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方法是评估社会流动程度高低和流动模式的关键方法,将这一方法运用到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有助于更直观地描述不同时期社会流动的状态和具体表现。

王先明即以河北磁县档案馆所藏“四清”时期的《阶级成分登记表》为基础,结合其他乡村社会调查资料,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富农阶层的社会流动作了动态分析。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广泛搜集并整理出一大批集体化时期山西农村的《阶级成分登记表》,建立了“阶级成分数据库”,以量化历史研究的方法对此进行综合性分析和研究。此外,还有学者通过搜集、分析大量统计年鉴和地方志中的数据,呈现了改革开放前中小学教师群体的社会流动和命运沉浮,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提供了样本。

在跨学科研究日益备受推崇的学术环境下,当代中国社会史的学科边界问题值得学术界重视。若漠视学科边界的存在,一味地追求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非但无益于当代中国社会史的繁荣发展,反而会导致学科自主性和独立性的丧失。

跨越学科边界走向跨学科的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既须固守史学本位,又要勇于打破学科界限;既要体察领会其他学科概念、理论与方法的独到见解,避免生搬硬套,又须坚持社会史研究史料为基、求真为本的学科特质,在求真基础上达致构建机制和探寻规律的求解目标。总之,当代中国社会史应将其他学科概念、理论与方法看作是研究的“动力、陪衬或指南”,而不是“现成的答案”,实现经验研究与理论的良性互动。唯有如此,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才能在学科交流中彰显史学研究独特的学术价值,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 《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4期,约18000字